

巴基斯坦的战略选择与战略困境

沈 宏

摘 要 巴基斯坦自建国以来形成发展了以“伊斯兰”、“联盟”和“进攻性防御”为核心内容的战略选择。在追求权力和安全的过程中,巴基斯坦与对其至关重要的三个国家存在矛盾和冲突。与邻国印度和阿富汗的对抗和摩擦以及与最强大盟友美国的不和,造成了巴基斯坦难以纾解的战略困境。未来巴基斯坦依然要在这种战略困境中面对其历史宿命。

关键词 巴基斯坦 战略选择 战略困境 美国 印度 阿富汗

在战略的视野中,权力与安全是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的重心。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对巴基斯坦而言,维护其权力与安全的困难,特别是与重要邻国印度和阿富汗矛盾不断,与最主要盟友美国若即若离,构成了其最主要的战略困境。对此,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经予以撰文解析,特别是他们基于巴基斯坦地缘环境和文化属性的考察,成为理解巴基斯坦战略困境的基本方法和观念基础。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国家间关系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巴基斯坦战略困境的形成与破解之难。

一、巴基斯坦的战略选择

自1947年建国以来,巴基斯坦一直面临着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紧张,为谋生存求发展,基于地缘状况、政府体制、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以及军事、经济、技术等限制性因素,它逐步形成了以“伊斯兰”、“联盟”和“进攻性防御”为核心内容的战略选择。^①

“伊斯兰”是巴基斯坦作为独立国家的重要社会文化特征,也是其立国的基础。尽管“伊斯兰”的战略选择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某种多样性和不同侧重,巴基斯

* 沈宏,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南京 210039)。

① 参见沈宏《巴基斯坦的战略选择:伊斯兰、联盟、进攻性防御》,《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

坦的政治精英自国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将“伊斯兰”作为整合各种战略资源、凝聚民众共识、维护国家安全与生存的动员工具。^①巴基斯坦始终强调自身的“伊斯兰”身份,积极参与泛伊斯兰运动,与伊斯兰国家发展紧密的联系与合作。而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演变,又进一步推动伊斯兰因素成为国家领袖和政府必须依赖的有效工具。^②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坚持将“联盟”作为谋求自身生存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主要是源于其复杂的地缘环境、鲜明的文化属性以及在动荡不安中成长的经历。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联盟”对巴基斯坦来说,是为增强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以抗衡其邻国的目的服务的。^③与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印度相比,巴基斯坦经济军事实力相对弱小,必须在区域外寻找强大的盟友以抗衡印度并维持自身的独立和安全。在巴基斯坦的战略设计中,美国、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是其联盟关系的三大支柱。美国是首屈一指的全球性大国,有能力也有意愿干预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中国是重要的地区强国,巴中两国长期以来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相互配合、紧密合作,结成了“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④伊斯兰世界则是巴基斯坦通过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纽带可以借重的战略依托和广阔后方。^⑤

此外,特别是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巴基斯坦积极推行“进攻性防御”的战略选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攻性防御”以巴基斯坦新时期军事学说的面貌被正式提出,并在2006年通过穆沙拉夫的公开讲话被再度确认,但其真实内涵和核心思想则贯穿了巴基斯坦从建国到当前的战略斗争实践。^⑥巴基斯坦的国土形状狭长扁平,缺乏有效的战略纵深,领土腹地以及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完全暴露在邻国的力量投送范围之内,又时而因为边界线、跨境民族、宗教等问题与邻国发生边境摩擦和冲突。此外,巴基斯坦的规模和实力难以承受敌国先发制人的进攻,其军队数量和质量不能与地区大国特别是与之长期敌对的印度相提并论,与周边中等邻国相比也不占绝对优势,其经济状况无法支撑长期的对抗和战争,有限的技术能力和战略储备也无法完全满足单凭自身进行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因此,对巴基斯坦来说,“进攻性防御”无疑是最经济有效的战略行为模式。特别是由于实力差距,巴基斯坦在与印度的军事斗争中不可能获得压倒性胜利,因而其最主要的战略目标是通过有限进攻和局部胜利迫使印度放弃对抗和进攻,即通过积极防御在战略上掌握主动,从而

① Husain Haqqani, *Pakistan: Between Mosque and Military*, Lahore: Vanguard Books, 2005, p. 2.

② Lawrence Ziring, *Pakistan at the Crosscurrent of History*, Lahore: Vanguard Books, 2004, pp. 45—66.

③ 参见(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1页。另见Ajay Darshan Behera and Joseph C. Mathew, eds., *Pakistan in a Changing Strategic Context*, New Delhi: Knowledge World, 2004, p. 107.

④ 中巴两国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参见Swaran Singh, ed., *China-Pakist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dian Perspectives*, New Delhi: Manohar, 2007;另见郑瑞祥《简论中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5期《胡锦涛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10年7月8日《温家宝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演讲》,《人民日报》2010年12月20日。

⑤ 参见Shahid M. Amin, *Pakistan's Foreign Policy: A Reappraisal*, 2nd edition,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27—156, 274—302.

⑥ 参见R. S. N. Singh, *The Military Factor in Pakistan*, New Delhi: Lancer, 2008, pp. 337—341.

更有效地吓阻和反击敌方的冒险和进攻,切实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

二、巴基斯坦战略困境的成因

伊斯兰、联盟、进攻性防御的战略选择,相应形成了巴基斯坦战略实践的基本特征,即对自由独立的关切、对联盟的依赖以及对武力的迷信。而宗教性质的民族主义、与西方的联盟以及与印度对抗形成的政策相互影响,有时是以细微和不可觉察的方式,有时甚至需要对某个部分进行曲解以使之相互适应。^①这部分反映出巴基斯坦艰难维护其权力与安全的战略困境。

与印度的竞争性对抗关系是巴基斯坦战略困境的主要成因。这种敌对关系可以追溯到1947年印巴分治,甚至更早期的英印殖民地全印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的相互竞争。分治建国,特别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不负责任的“分而治之”和“退出”政策,以及印巴两国仍然是英帝国的自治领和土邦有权自行选择归并印巴任何一方的决定,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经济联系和力量平衡,使南亚次大陆各教派信众特别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对立情绪达到顶点,造成了地区历史上最严重的冲突和人道主义灾难。^②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许多城市村镇在暴行和武装冲突中变成废墟,流徙的难民超过1700万人,数百万人死亡。^③两个新兴国家还围绕殖民地财产分配和土邦归属问题,特别是克什米尔地区的主导权问题发生争执和矛盾。^④上述事态引发了印巴两国的长期敌对,穆斯林对“多数人统治”的恐惧和与“印度霸权”对抗的决心得到进一步强化,两国政府以及人民之间的安全互信荡然无存,一种不安全的竞争性对抗的国家间关系结构在南亚地区固定下来,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被强化。独立之初的巴基斯坦未能像印度那样继承英国殖民者管理的首都、政府以及组织行政、经济和军事机构的资金,而相互的宗教仇杀使得大批穆斯林涌入这个新生国家。^⑤巴基斯坦军队按分治规定获得15万人的总员额,只是原英印皇家军队的三分之一,而且无论人员装备还是指挥水平都十分落后。^⑥7000万本土居民和700万印度移民混合构成了巴基斯坦,其基本的情感特征就是对印度人的仇恨和恐惧,以及对伊斯兰的

① Husain Haqqani, *Pakistan: Between Mosque and Military*, pp. 15—16.

② 分治前后,印度次大陆事实上已经陷入内战状态,参见 Noor ul Haq, *Making of Pakistan: The Military Perspective*, New Delhi: Reliance Publishing House, 2009, pp. 146—160.

③ Sugata Bose and Ayesha Jalal, *Modern South Asia: History, Culture,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190.

④ 参见(巴基斯坦)M·A·拉希姆等著, J·H·库雷希主编《巴基斯坦简史》(第四卷),四川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76—390页。

⑤ 参见 Suroosh Irfani, ed., *Fifty Years of Kashmir Dispute*, Muzaffarabad: University of Azad Jammu and Kashmir, 1997, pp. 11—12.

⑥ 根据印巴分治方案,英印皇家军队按照64:36的比例划分给印巴两国,其中穆斯林军人还拥有自由选择权,可以按照本人意愿加入印、巴任何一国的军队。参见 Shalini Chawla, *Pakistan's Military and Its Strategy*, New Delhi: Knowledge World Publishers, 2009, p. 3.

信仰和依赖。^①凭借这种情感,巴基斯坦分别于1948年和1965年在克什米尔与印度展开了武装较量,并获得了一种超越真实实力对比的不输不赢的结果。战争引发了国内危机,1971年孟加拉地区爆发了要求自主自治的群众运动,并最终导致巴基斯坦内战。^②内战的升级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和关注,并导致印度进一步加强与苏联的战略合作和介入,巴基斯坦最后被印度肢解和分裂。^③战败的巴基斯坦并未停止与印度展开竞争和对抗,不仅利用国际和地区合作的舞台反击印度建立地区霸权的企图,还针锋相对地进行军事斗争,持续在克什米尔地区与印度展开较量。冷战结束后,巴基斯坦更进一步推进“追踪外交”和“能源外交”,与印度在中亚五国、阿富汗、海湾国家展开外交竞争。90年代中后期,巴基斯坦又与印度展开战略竞赛,大力进行弹道导弹和核武器技术试验,同时在克什米尔的卡吉尔地区与印度发生局部战争形态的武装对抗。21世纪以来,尽管巴印两国不断推动和平进程,但两国之间的对抗也从未停息。穆沙拉夫执政时期,两国多次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军事对峙。人民党扎尔达里集团全面主政之后,两国也曾因为孟买恐怖袭击事件而几乎走到战争边缘。

与另一个重要邻国阿富汗的历史恩怨和边境摩擦,构成了巴基斯坦战略困境的重要成因。尽管拥有共同的伊斯兰宗教信仰,巴阿两国非但没有成为兄弟之国,反而在国家间交往的历史中矛盾不断。巴基斯坦的帕坦族人和阿富汗的普什图族人同宗同源,分别是本国第三和第一大人口族群,占各自国家人口的10%和40%,对各自国家的内政外交都具有重大影响。两族的分离和两国边界的划分是西方殖民主义时代英国和俄国进行中亚大竞争的结果。巴基斯坦建国时,阿富汗和印度一样高度质疑其作为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对帕坦民族及其领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拒绝承认英国人主导的西北边境省归并巴基斯坦的民族自决。^④阿富汗甚至是巴基斯坦加入联合国时唯一投反对票的国家。边界线和跨界民族问题导致巴阿两国在50年代多次发生边境冲突并两次断绝外交关系。^⑤亲苏的阿富汗民族主义政府上台后,两国边境摩擦更加频繁。1979年苏军入侵并占领阿富汗,巴基斯坦主要依靠美国的支持,成为抵抗苏联的“前线国家”,暗中支持阿富汗境内的反苏反政府组织,并在本国境内培植阿富汗亲巴势力。苏军撤离阿富汗后,巴基斯坦又积极介入阿富汗内战以

① Farzana Shaikh, *Making Sense of Pakistan*,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9, p. 4; Rajshree Jetly, ed., *Pakistan in Regional and Global Politics*, New Delhi: Routledge, 2009, p. 191.

② 参见 Robert LaPorte, Jr., “Pakistan in 1971: The Disintegration of a Nation”, *Asian Survey*, Vol. 12, No. 2, February 1972, p. 102.

③ 参见 Rounaq Jahan, *Pakistan: Failure in National Integ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Richard Sisson and Leo Rose, *War and Secession: Pakistan, India, and the Creation of Banglades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Hasan Zaheer, *The Separation of East Pakistan: The Rise and Realization of Bengali Muslim Nationalism*,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④ Nabi Misdaq, *Afghanistan: Political Frailty and External Interfere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297.

⑤ 关于阿巴两国围绕英国划定的“杜兰线”的矛盾和斗争,参见曾祥裕《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研究:1980—1992》,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22—23、38页。

寻求扩大北方“战略纵深”,并于90年代中期支持“塔利班”组织控制了阿富汗绝大部分领土。“9·11”事件后,巴基斯坦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放弃支持“塔利班”政权。阿富汗卡尔扎伊政府上台后,采取亲西方和亲印度的外交政策路线,加之长期战争引发的阿富汗难民和跨界犯罪活动等问题,使得巴阿两国关系发展始终不顺。

此外,与美国的分歧和矛盾也是巴基斯坦战略困境的重要成因。美国是巴基斯坦对外联盟战略的重心,然而长期以来巴美两国在很多方面不能协调一致,巴基斯坦战略选择的执行经常受到美国的掣肘和影响。其实,与西方国家集团特别是美国结盟,是巴基斯坦缔造者真纳及其主要助手里阿夸特的既定方针。^①立国之初的巴基斯坦虽就人口规模而言是世界第五大国,但它被印度、苏联和中国三个更强大的国家所包围,因此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美苏两大强权的竞争和对抗。^②50年代,文官和军人集团逐步取代陷于涣散的穆斯林联盟,成为巴基斯坦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③为维护国内稳定和借助外部势力对抗印度,“文官—军人联合体”倾向于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因此积极响应美国针对苏联的“北层防御”以及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1954年5月,巴美两国签订军事和经济援助条约,9月巴基斯坦加入美国主导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次年9月加入美国支持的由英国、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参加的《巴格达条约》(即之后的《中央条约》)。巴基斯坦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最亲密盟国”。^④但美国不仅限制巴基斯坦与印度竞争,而且还不顾巴基斯坦的反对,在中印边界冲突前后给予印度大量军事经济援助。^⑤巴基斯坦于是转向寻求中国和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并终止了美国在巴基斯坦建立和使用侦察基地的协议。^⑥1963年的巴中边界协议和1965年的巴印战争导致巴美关系急速降温,直至苏联的威胁日益上升,两国关系才得以逐渐恢复,巴基斯坦甚至还有力促成了中美关系重建。但美国未能在1971年印巴战争中给予巴基斯坦实际支持,战败的巴基斯坦不得不重新回到大国平衡的外交路线。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巴基斯坦再次成为美国抵抗苏联扩张的重要盟友,美国给予其大量援助。然而苏军撤离以及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重新规划中亚和南亚的战略布局,倾向于与印度结成更紧密的关系,巴美关系再度降温。美国

① 参见 C. Dasgupta, *War and Diplomacy in Kashmir 1947—1948*, New Delhi: Saga, 2002, p. 15; Dennis Kux,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1947—2000: Disenchanted Allies*,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1, p. 13。

② R. S. N. Singh, *The Military Factor in Pakistan*, p. 151。

③ 参见 Keith Callard, *Pakistan: A Political Stud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7; M. A. Chaudhuri, *The Civil Service in Pakistan*, Dacca: 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63; Henry F. Goodnow, *The Civil Service of Pakistan: Bureaucracy in a New 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④ Mohammad Ayub Khan, *Friends Not Masters: A Political Autobiograph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30。

⑤ 基于地缘因素考虑,巴基斯坦分别参加了美国主导的两个属于不同地域的军事同盟体系,但美国强调1959年行政协定“不包括巴基斯坦在遭受印度攻击时美国对巴基斯坦提供安全保障的义务”。参见 Sudhansu Kumar Patnaik, *Pakistan Foreign Policy*, Delhi: Kalpaz Publication, 2005, p. 94; Abdul Sattar, *Pakistan's Foreign Policy 1947—2005: A Concise History*,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7。

⑥ 参见 S. M. Khan, *Memories and Reflections of a Pakistani Diplomat*, London: Center for Pakistan Studies, 1998, p. 234。

在核不扩散和国内民主等问题上不断向巴基斯坦发难。巴基斯坦则不顾美国的表态和劝解,与印度展开核军备竞赛,通过6次核试爆宣告跨入核国家行列。巴美关系的又一次重要转折是“9·11”事件,穆沙拉夫政府宣布全力支持美国政府发起的全球反恐战争,不仅摆脱了1998年核试验和1999年政变后的国际孤立,而且成为美国的“非北约同盟国”,获得了大量军事经济援助。^①但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两国开始暴露严重的立场分歧,美国不满巴基斯坦参与反恐战争的力度以及国内民主的进程,巴基斯坦则不满美国与印度开展战略合作以及对巴内政外交的干涉。扎尔达里上台执政后,美国给予巴基斯坦一定程度的支持,但在反恐与地区和平等问题上持续对巴施压。2011年,美国派遣特种部队深入巴境内成功击毙本·拉登,之后又强迫巴基斯坦打击和清除“基地”组织和“哈卡尼”网络,激起了巴基斯坦国内强烈的反美情绪,两国关系再度陷入波折。

三、巴基斯坦战略困境的纠结

巴基斯坦与印度和阿富汗的对抗和摩擦以及与美国的不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巴基斯坦的战略困境,而这种困境对其而言是难以解决的。

首先,与印度的竞争和对抗将是长期的。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对立和矛盾是结构性的,这不仅表现在两国的立国理念和意识形态上,也反映在两国的战略实践上。巴基斯坦追求成为“南亚穆斯林家园”,因此断然从英属印度中分离出来,其背后的隐喻就是“不做印度人”。“伊斯兰”不仅作为一种身份标记,而且作为必须坚持的立场和战略选择,存在于其国家政策和行为实践之中。然而,印度自印巴分治时起就自视为大英帝国南亚遗产的天然继承人,并立志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②其大国雄心意味着它作为南亚首要大国,必须从整体上全盘考虑整个南亚的战略与安全,将周边中小国家纳入其控制和总体战略规划,而巴基斯坦所处的位置,恰好是英印殖民地时期印度的边疆和前线,同时也是整个南亚和新的印度大国的战略前沿,所以对印度而言,独立的巴基斯坦可以存在,但不顺从印度主导国地位和总体战略谋划的巴基斯坦不能存在。但是对巴基斯坦而言,顺从印度不仅有违其立国目标,而且将从根本上危及其生存和发展。两国在战略和安全乃至地理和经济上的联系,特别是印度已经成为南亚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现实,导致受诸多内部问题所困扰的巴基斯坦,面临被更强大同时也更适合南亚多元文化、多元社会特征的世俗化印度消解和同化的危险。巴基斯坦必须至少在南亚地区内寻求

^① 参见 B. M. Reddy, “Pak. Offers Full Support to U. S.,” *The Hindu*, September 14, 2001; Lawrence Ziring, *Pakistan at the Crosscurrent of History*, pp. 303—315; Rajshree Jetly, ed., *Pakistan in Regional and Global Politics*, pp. 70—81。另见杨道金《铁腕总统:佩尔维兹·穆沙拉夫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张春燕《美国南亚平衡战略的变化与延续——从小布什到奥巴马》,《南亚研究季刊》2010年第1期,第35页。

^② 参见(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心译,北京:世界知识社,1958年,第57页。

与印度“平起平坐”，因而也就必须坚持与印度有所差异的国家身份以彰显其存在，坚持从区域外寻求盟友支援以平衡印度的实力优势，坚持对抗性的防御以保证自身安全与生存发展。巴基斯坦为此将自己形容为“世界之轴”和“亚洲心脏”。^①印巴两国的关系，强烈地表现为主要依据长期的记忆来塑造设想中的未来双边关系，并在这一框架内发展两国短期关系。^②两国关系紧张也成为一种常态。^③这种结构性矛盾最重大的后果是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竞争的长期化。克什米尔俯瞰印度河平原和恒河平原，是中亚、南亚和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连接部，面积与英国相当，有753万人口（2001年），主体为穆斯林。该地区对印巴两国均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是两国对抗的焦点，任何一方都难以在这个“零和”博弈中做出让步。^④尽管印度凭借实力优势占据丰饶的河谷地区和绝大部分人口，但占有该地区五分之二土地和四分之一人口的巴基斯坦也从未放弃对克什米尔主权的主张，并不时通过“激活”该问题而对印度发起挑战。克什米尔问题成为两国关系中难解的“死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两国对抗性关系长期化的集中反映。

其次，与阿富汗相关的问题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解决。阿富汗对于巴基斯坦的战略与安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自古以来，对巴基斯坦地区的征服，大多从北方边境的山口关隘而来，来自中亚的地缘安全威胁往往超过了来自恒河平原的威胁。由于处在中亚、南亚和东亚十字路口的关键性地理位置，阿富汗是巴基斯坦防备来自北方和西部安全威胁的屏障和缓冲，同时在后者与印度的竞争和对抗中，阿富汗也能为其提供防御纵深，以及与具有相同伊斯兰文化属性的中亚和西亚国家进行联系合作的战略通道。巴基斯坦全力抵御来自阿富汗的消极影响并积极干预后者的局势发展，完全符合其战略与安全需要。然而，阿富汗的地缘位置及战略价值，决定了地区重要国家和全球权势大国都将在这个历史上被称作“帝国坟场”的地方进行竞争和角逐，巴基斯坦对阿富汗的干预和控制，不仅要面对来自阿富汗的阻力，更要面对来自这些更强大国家的压力。与此同时，仅就两国间关系而言，阿富汗对巴基斯坦来说是一个“麻烦”的邻居。普什图人不承认也不认真遵守两国约2500多公里的边界线，他们尊敬部落宗法更胜于尊敬政府和国家法律。特别是巴基斯坦至今仍滞留着300万阿富汗难民，政府无力进行良好管理和救助，这不仅成为巴基斯坦的严重负担，还深刻影响着两国边境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生态。^⑤而阿富汗国家治理的失败以

① 参见 Margaret Bourke-White, *Halfway to Freedo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49, p. 92; Liaquat Ali Khan, *Pakistan, The Heart of Asia: Speech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May and June 19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② 宋德星《印巴安全两难与中国的南亚政策》，《南亚研究》2002年第1期，第35页。

③ 参见 Sumit Ganguly, *Conflict Unending: India-Pakistan Tensions since 1947*,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④ 参见 Raju G. C. Thomas, ed., *Perspectives on Kashmir: The Roots of Conflict in South Asi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⑤ 民族和种族问题还对巴基斯坦的外交和战略产生着重要影响。参见 Mehtab Ali Shah, *The Foreign Policy of Pakistan: Ethnic Impacts on Diplomacy, 1971—1994*, London: I. B. Tauris, 1997.

及国际强权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也将其负面后果外溢到阿巴边界的另一侧,盘踞在阿富汗南方广大农村地区的地方军阀武装、有组织犯罪集团、民族分离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时常在遭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和政府军打击或巴基斯坦管控不力的时候进入巴基斯坦境内,他们来去自由的越界活动给巴基斯坦的社会治安和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特别是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之后,巴基斯坦不得不在巴阿边境地区长期维持10万人左右的正规军和准军事部队,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应对印度威胁和国内危机的稳定力量,而这种状况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改善。^①

最后,与美国的关系不可能一帆风顺。巴基斯坦的战略选择决定了它既要依赖美国又不能完全听命于美国,然而由于两国实力和能力的不对等,美国占据着合作的主导地位,一旦两国的战略目标及其执行不尽一致,巴基斯坦就不得不在是否顺从美国的问题上进行利益计算。大多数时候,巴美两国的战略目标和利益是不一致的,巴基斯坦时常被迫进入美国的战略设计轨道。巴基斯坦的战略目标简单明确,就是利用美国的同盟关系和经济军事支援平衡印度的力量优势。但美国的目标则复杂很多,美国作为世界性大国不仅有地区层面的战略设计,更要在全球层面谋划对外关系和力量分布。美国对南亚事务的介入,源于填补二战后英国退出南亚的力量真空,以及在侧翼位置推进全球冷战对苏联和中国进行战略围堵。其目标不仅是要在南亚和印度洋保持力量存在,同时还要利用这种力量存在以及由此形成的战略优势影响和塑造周边环境,限制挑战美国全球优势地位的力量的增长。就此而言,美国在南亚地区推进战略合作的重心实际是实力规模更为强大的印度,巴基斯坦仅仅是用以限制印度和其他地区大国的战略筹码和工具。巴美关系充满戏剧性波折的历史演变也证明了这一事实。美国实际上一直对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印度保持友好姿态和紧密联系,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印战略合作有逐步提升的趋势。^②巴基斯坦尽管对此严重不满,但也无能为力,只能凭借自身的地缘优势和战略价值,干扰和牵制美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③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文化属性和战略选择,也决定了巴美两国关系尽管对彼此都很重要,但却无法真正实现亲密无间。美国对巴积极参与泛伊斯兰运动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斗争十分反感,对巴基斯坦与伊斯兰宗教势力的联系也时常提出批评。美国在冷战终结后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进入21世纪特别是“9·11”事件后,又将伊斯兰国家作为其主要对立面。由其主导的反恐战争在穆斯林世界引发和积聚巨大的内部紧张并

^① 巴基斯坦在巴阿边界的军事存在,一方面为阻止阿富汗境内恐怖主义势力渗透,另一方面则是为防备和打击“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TP),它与阿富汗“塔利班”实际上只有思想渊源的关联,其主体是巴境内的部落武装。参见 Usama Butt and N. Elahi, eds., *Pakistan's Quagmire: Security,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the Islamic-nuclear Nation*, New York: Continuum, 2010, pp. 233—251。

^② 参见 Rajshree Jetly, ed., *Pakistan in Regional and Global Politics*, pp. 64—67。

^③ 巴基斯坦宣布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一方面为改善已经恶化的两国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为阻止自2000年克林顿政府宣布“发展面向21世纪更紧密和实质性美印新关系”以来美印两国日益接近的势头。参见 Surya Narain Yadav, *India-America Strategic Partnership: Experiences and Expectations*, New Delhi: Global Vision Publishing House, 2010, p. 13。另参见杨道金《铁腕总统:佩尔维兹·穆沙拉夫传》,第177页。

严重牵动大国关系,国际关系出现局部重组趋势。^①巴基斯坦国内也由此积累了相当程度的反美情绪。穆沙拉夫执政当局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支持美国反恐和寻求国内保守势力支持之间维持脆弱的平衡。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巴基斯坦支持美国全球反恐政策的力度明显减弱,还在多个国际场合宣扬和重申试图调和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现实冲突的“温和文明论”观点,强调穆斯林世界将抵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但西方发达国家也应该公正对待穆斯林国家,支持穆斯林国家发展社会政治经济。^②而美国则不顾巴基斯坦的利益和感受,按照自己的思维和计划不断强制推进阿富汗和巴阿边境地区的反恐战争,其压迫巴基斯坦按其命令行事和越境打击恐怖分子的行为,令巴基斯坦政府和民众十分不满。

四、巴基斯坦战略谋划的未来

战略是意志和能力的博弈,是目标、手段和执行的综合过程。因而,战略困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行为主体无法从容应对来自对手的竞争和压迫,且这多半是因为战略行为主体的目标过高、手段不足以及执行不力。

巴基斯坦的权力与安全的获得,有赖于妥善处理与印度、阿富汗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与问题,然而由于矛盾和问题本身以及对手和自身的原因,巴基斯坦对此往往表现得力不从心。印度积极谋求世界大国的地位,正在迅速崛起。^③阿富汗在混乱和不安中陷入失败,为巴基斯坦提供战略纵深和稳定后方的前景遥不可及。美国凭借全球首要强权的优势地位对巴基斯坦颐指气使,极少真正关心巴基斯坦的利益诉求和切身感受。计算和控制上述三国的行动及其走向,远非巴基斯坦力所能及,相反巴基斯坦的谋划设计和政策执行往往受这三个国家的影响和限制。

对巴基斯坦而言,谋求成为受尊敬的穆斯林强国并不能算是一个过分的目标。事实上,在极度困难的境地中立足生存,在国家分裂的巨大灾难中重新恢复,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凭借自身智慧和能力跻身世界重要国家行列,已经足以令巴基斯坦感到自豪。^④然而诸多大国的包围及其光芒掩盖了巴基斯坦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的成就,新的多极化时代的发展也难以让巴基斯坦这样的中小国家获得很大的展示能力的

① 时殷弘《9·11后三项重大问题的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期,第45—47页。

② (巴基斯坦)佩尔维兹·穆沙拉夫《在火线上:穆沙拉夫回忆录》张春祥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293—294页;另见Rajshree Jetly, ed., *Pakistan in Regional and Global Politics*, p. 78。

③ 参见宋德星、时殷弘《世界政治中印度和平崛起的现实和前景》,《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

④ 巴基斯坦在国家分裂后重新复兴并成功抵抗了强大苏联的压力,被内部和外界认为是“一个超越地理意义的意识形态奇迹”,“将注定成为从亚洲到非洲的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先驱和榜样”。参见Barrister Sameen Khan, “Defence: The Jihad Syndrome”, *Defence Journal*, Vol. 16, No. 1&2, 1990, p. 29。转引自Stephen Philip Cohen, *The Idea of Pakistan*, Lahore: Vanguard Books, 2005, p. 172。

机会, 尽管很多时候它的确是以重要的战略参与者面貌出现的。^①而大国目标和地位的实现不仅必须遵从环境与现实, 同时还有赖于手段的充足和完备。巴基斯坦显然缺乏这样的条件, 在与印度、阿富汗和美国的斗争和交往中, 可用的资源和手段往往捉襟见肘, 无法经受对抗和消耗。特别是其不够独立和健全的经济能力, 严重制约政策目标及其执行。巴基斯坦对总体战略规划的执行不力, 不仅有目标过高、手段不足的因素, 更主要的是巴基斯坦至今尚未完全摆脱“强社会、弱国家”的国家—社会关系形态, 统一的国家民族和成熟的现代国家体制未能通过充分的自然进化得以形成和确立。^②巴基斯坦缺乏形成现代国家的许多基本条件, 特别是民族认同和政治统一, 复杂的种族和民族状况导致其立国几十年后依然没有解决国家认同问题, 民众信仰宗教更胜于遵从宪法和国家, 真主的训诫往往超越政府的法令, 因此政治精英不得不依赖伊斯兰作为国家整合的工具。^③另一方面, 不同的种族、阶层、教派有着不同的政治理想和目标, 对伊斯兰教义也抱有各自不同的解释, 彼此还存在以“圣战”为名的武装冲突, 这成为国家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障碍。^④此外, 巴基斯坦的宪政治理存在明显缺陷, 各派势力围绕宪法制定和执行的斗争造成政局长期动荡, 而一些涉及国家根本的宪政问题也没有得以妥善解决, 比如民族认同、伊斯兰教地位、总统和总理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等问题。^⑤而上述这些问题在根本上影响着战略的执行及其效力。

巴基斯坦是作为一种理想追求和一个现实国度的双重意象而存在的, 国家缔造者们希望用巴基斯坦的理想去成就一个巴基斯坦国家。^⑥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 巴基斯坦将不得不长期陷于战略困境, 惟有通过不断的奋斗和不断的挫折, 才能赢得尊严、证明价值并取得进步, 这可能是巴基斯坦无法逃避的历史宿命。

(责任编辑: 李 丹)

① 至少有四大理由支持巴基斯坦是全球重要战略参与者的观点: (1) 位于南亚、中亚和中东的十字路口, 是地区重要国家, 有显著经济潜力, 特别在油气和交通运输方面; (2) 1998年以后与印度一起成为有核国家, 两国均未参加核不扩散条约(NPT)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 在两国大力发展导弹技术的条件下, 南亚核武化有扩大趋势; (3) 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PKO)提供约1万名军警, 占维和行动总人数的10%, 是国际维和的最大贡献国之一; (4) 作为伊斯兰会议组织(OIC)最大和最早的成员国之一, 在占世界人口20%的15亿穆斯林人口中有巨大影响, 相关国际问题必须考虑其地位和作用。此外, 巴基斯坦目前已拥有60万正规军以及50万准军事部队和后备役人员, 组织严密, 武器装备较为先进, 军力号称世界第七。

② 关于“强社会、弱国家”的国家—社会关系, 参见(美)乔尔·S·米格德尔《强社会与弱国家: 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年。

③ 参见金宜久《当代伊斯兰教》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5年, 第141页; 另见Khaled Ahmed, *Religious Developments in Pakistan 1999—2008*, Lahore: Vanguard Books, 2010, pp. 290—294; Mehtab Ali Shah, *The Foreign Policy of Pakistan: Ethnic Impacts on Diplomacy, 1971—1994*, p. 1; Christophe Jaffrelot, ed., *Pakistan: Nationalism without a Nation?* New Delhi: Manohar, 2002, p. 7。

④ 参见Javid Iqbal, *Islam and Pakistan's Identity*, Lahore: Vanguard Books, 2003, pp. 115—148; S. V. R. Nasr, “Islam, the State and the Rise of Sectarian Militancy in Pakistan”, in Christophe Jaffrelot, ed., *Pakistan: Nationalism without a Nation?* pp. 85—114。

⑤ 参见欧阳景根《当代巴基斯坦政治动荡的宪法解释》, 《学海》2005年第4期, 第76—80页。

⑥ 参见Stephen Philip Cohen, *The Idea of Pakistan*, pp. 2—3。

2019á'á°á'æ|è£...á†²çª¼CEäºZ2019á'2æœ²6æ—¥çˆ†á¼CEá°á°|ç©°á†²çš,,12æž¶á¹»è±;2000æ~æ—
æœ°é£žè¶¶Šá...ä»€ç±³á°"á°á'áœç«çº¿¼CEá¹á'áÝ°æ-á|è¿,è;CEç©°èçá€á,á°á°|á°£ç§ºç©°èç-
äºæš¥áªä,ªæ~ÝæœÝá%çš,,æ™@á°"ç"¡é©-èçá†»á€, 2æœ²26æ—¥¼CEá°á°|æ-1éçèj"çª¼CEá°á†²æ~æœºç©°èçä,€ä,ª¼áºZá·
'æ%ç§ºçº°çš,,ç©†ç½°é~á¾·á†²æ|è£...áˆ†áè¥áœº¼CEá†²æ™è†³á°'350áæ|è£...áˆ†áážè¿"á·žá°á°|éç†ç©°¼CEé€"ä,-
æ²jæœ%ä,žá·áÝ°æ-á|ç©°á†²áç"Ýá†²çªá€,á·áÝ°æ-á|æ-1éçèj"çª¼CEá°á†²æ~æœºá¾µá...¥ç©†æ%žæ³·æ%ã·á¾·é™,,è¿çš,,á·
'áÝ°æ-á|éç†ç©°¼CEá·æ-1æ~æœºç§æ€¥á†ç©°á»¥á½œá·žáº¼CEá¹¶é€¼á½¿á°á°|á†²æœºè¿"á·žá...¶éç†ç©°á€,æœÝé—'á°æ-
1ä,çä,æ~æœºçš,,éçˆ†è'Ýè-á€,á·áÝ°æ-á|è¿çªºá°á†²ç©°èçæœªé€ æˆä»»á½°äººá'á¼ªº|á€, 2æœ²27æ—¥¼CEá°á·áCEæ-
1á†æ-¡áœ"á...ä»€ç±³á°"áœ°áCEºá±·á¼ç©°æ~á€, á¹ è¿'á¹³áœçç-á...«è½œä,ç¾¿žæ~ç·¥ä,žç»æµžá¹è-á'CEç-á,fè½œä,-
ç¾¿žáºæ-†áºæµé«~á±,ç£·á·†è"áˆá¼€á¹·á¼ä,šçš,,èœ²è- Xi: Making Unremitting Efforts for 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Á 6æœ²6æ—¥¼CEá½á°¶ä,»á,á¹ è¿'á¹³á†ºá,áœ"áCE—
äº-é"é±¼á°á·½á°¾¾é|†á¾¾è;CEçš,,ç-á...«è½œä,ç¾¿žæ~ç·¥ä,žç»æµžá¹è-á'CEç-á,fè½œä,ç¾¿žáºæ-
†áºæµé«~á±,ç£·á·†è"áˆá¼€á¹·á¼¼¼CEá¹¶á'èj"éç~ä,ºá€šä,ºæž,, á»ºá,ç¾¿žæ-áž·áªšá·½á...³ç³»è€CEä,æ†ˆášªáš·á€çš,,é†è|è²è-á€,
[æ-ºážçª¾ éž é¹ æ',]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delivers a keynote speech at the joint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eighth China-U.S.